

国际组织丛书



和平行动的评价

[美] 保罗·F. 戴尔 [美] 丹尼尔·德鲁克曼◎著

聂 军◎译

该书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和平行动。对于一项特定的和平行动而言，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对于这些标准的测量是如何进行的？本书首先确定了一个用以评价和平行动的框架。作者根据这个框架，提出了和平行动的三套目标。这三套目标分别是核心目标（暴力的减退、冲突的遏制和冲突的调解）、非传统维和目标（监督选举、民主化、人道主义援助、解除武装、复员和回归社会和‘人权保护’）、冲突后精准和平目标（地方治安、法治、地方治理、恢复、和解和变革）。每一种目标都有一些内在的次目标。对于目标的实现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进一步测量都设置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对评价和平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本书还考察了环境对和平行动成功的重要影响。最后，本书对如何更好地应用这个框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用波斯尼亚维和的案例来说明。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际组织丛书



和平行动的评价

[美] 保罗·F. 戴尔 [美] 丹尼尔·德鲁克曼◎著

聂 军◎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该书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和平行动。对于一项特定的和平行动而言,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用以评价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对于这些标准的测量是如何进行的?本书首先确定了一个用以评价和平行动的框架。作者根据这个框架,提出了和平行动任务的三套目标,这三套目标分别是核心目标(暴力的减缓、冲突的遏制和冲突的调解)、非传统维和目标(监督选举、民主化、人道主义援助、解除武装、复员和回归社会和/或人权保护)、冲突后缔造和平目标(地方治安、法治、地方治理、恢复、和解和变革)。每一种目标都有一些内在的次目标,对于目标的实现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进一步测量都设置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对评价和平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本书还考察了环境对和平行动成功的重要影响。最后,本书对如何更好地整合性应用这个框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用波斯尼亚维和的案例来进行说明。

本书对了解和平行动以及从事和平行动研究和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贺小霞

责任出版:刘译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行动的评价/(美)戴尔(Diehl, P. F.),
(美)德鲁克曼(Druckman, D.)著;聂军译. —北京:知识
产权出版社, 2013. 3

(国际组织丛书)

ISBN 978-7-5130-1447-2

I. ①和… II. ①戴… ②聂… III. ①维和行动—研究 IV. ①D81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5058号

Copyright © 2010 b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国际组织丛书

和平行动的评价

HEPING XINGDONG DE PINGJIA

[美]保罗·F.戴尔 [美]丹尼尔·德鲁克曼 著
聂军 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29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字 数: 210千字

ISBN 978-7-5130-1447-2/D·1543 (4322)

京权图字: 01-2012-4977

邮 编: 100088

邮 箱: 2006hexiaoxia@sina.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HeXiaoXia@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3.25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一直到 1990 年，和平行动一直较少作为冲突管理的战略，这个时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作用较为有限的时期。这些模式在过去的 20 年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相应地，对这些和平行动的评价的需要也在增加，对中国更是如此。

“冷战”时期，联合国实施了不过 12 项和平行动。这些和平行动大多数局限于超级大国各自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这些和平行动的任务也是极为有限的；维和行动使用不带武器的观察员和少数的携带轻武器的士兵执行传统的监督停火的任务。20 世纪结束之时，许多人认为，维和行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国际社会应另寻他途来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

尽管这些预期较为悲观，但是，维和（现在最好用更为宽泛的术语“和平行动”来概述其特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枝繁叶茂，并且在许多维度上超越以往。第一，和平行动绝对数量增加了，“冷战”后的和平行动是之前 45 年中和平行动的 4 倍多。此外，联合国不再是和平行动唯一的或主要的提供者。许多地区性的组织，包括欧盟和非盟，都已积极参与了组织、资助和部署和平行动。愈益普遍的是所谓的“混合动力”的和平行动，各种不同的组织在和平行动的不同方面承担责任。而且，那些需要数百或上千维和士兵的小型和平行动已经被 1 万人以上部队的和平行动取而代之。2010 年，有 20 万维和人员参与了由 12 个国际组织和多个多国联盟部署在五大洲的 57 次和平行动。

或许在和平行动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和平行动在任务和数目上或者他们履行的使命方面的扩充。除了监督停火外，和平行动已经被赋予了与监督选举、解散武装、复员和与回归社会（DDR）、人道主义援助、地方安全、缔造和平和人权保护等相关的使命。因此，和平行动是一个灵活的、多层面的冲突管理机制，适应了国际社会以及所有的冲突阶段——冲突前、激烈的战斗中、停火之后与和平调解协议签署之后等相关的不同需要。和平行动的这些扩张的功能可以通过本书的框架和分析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和平行动的数量和责

任扩充相伴而生的是，中国在这些和平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加。1971 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在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授权方面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履行资助这些和平行动的义务。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在安理会的席位以及在更为广泛的国际事务方面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利益和对和平行动的参与也在增加，但是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中国只参与了 1988 年处理和平与安全事务的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委员会。一年之后，1989 年，中国向纳米比亚派出选举观察员。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积极参与和平行动是中国支持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UNTAC）的创建，联柬权力机构推动了越南撤军和监督了那里举行的选举。除了在政治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外，中国也提供了一些重建方面的工程师。1990 年，中国向中东长期部署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派出了少量的观察员。

2000 年以后，中国直接参与的和平行动大量增加。如图 1 所示，在过去的 10 年里，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中国向联合国和平行动提供的人员数量开始增加。这些人员分别以多种形式派遣，分别是士兵、军事观察员和警察。从整体上来看，现在这些数字已经超过了 2000 人，相比中国军队的总规模而言还是较小，但是与其他联合国成员（中国现在派遣人员的数目在 193 个成员国中排名第 14 位）的派遣人员和早期中国没有派遣人员相比，这些数字是巨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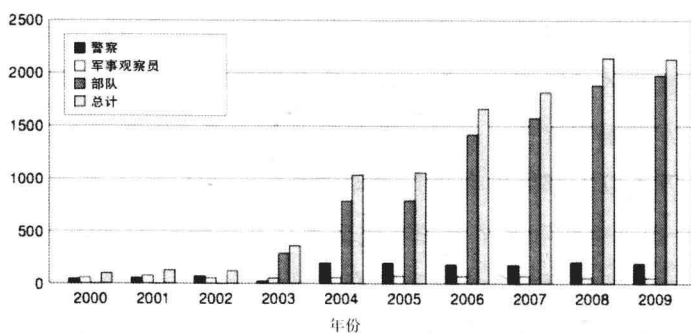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的人员数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人员捐献月份汇总表（警察、军事观察员和部队）”（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

除派遣人员方面绝对数目增加外，中国在其他维度方面参与和平行动也增加了。第一，部队派遣的区域已经大大拓展，现在包括在五大不同的地理区域参与 11 项和平行动，这些区域分别是：西半球（海地）、非洲（利比里亚）、

中东（黎巴嫩）、欧洲（科索沃）和亚太（东帝汶）。中国参与非洲的和平行动最多（6次和平行动），但是，这只是反映了联合国在非洲部署了较多的和平行动（主要是稳定一国国内局势），而不是反映了中国故意选择关注那个地区。此外，中国现在是联合国和平行动主要的资金资助国之一，捐献了3%的和平行动经费，仅有6个国家超过了这一数目（这6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结合最近在和平行动方面的急剧变化和中国在这些和平行动中的作用增强，中国必须关注这些和平行动的实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平行动可能是有效的？正在进行的和平行动是如何实施的？什么时候适合改变战略？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相关问题的答案要求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和平行动的有效性作出准确和合适的判断。这些判断可以通过本书构建的框架而作出。

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评价和平行动以及和平行动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合适标准的问题。然后，我们指出了3种类型的维和目标的维度：核心、非传统和战后缔造和平目标。对于每一个目标，都提到一些关键的政策评价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的优点和局限，我们提出了测量取得成绩的具体指标。

此外，我们也对和平行动实施的环境背景的一些维度进行了界定，并且将它们对冲突的影响进行了评价。我们运用一个详细的案例分析表明如何使用这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是评价和平行动影响以及掌握这些成功维度之间互动特征的一种模式。通过应用本书框架，中国的学术界和政府官员能够确定他们对和平行动的信念以及付出是否值得，以及和平行动怎样更好地为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服务。

戴 尔

2012年4月22日

致 谢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评论和建议。此外，我们也要感谢安德鲁·奥斯艾克（Andrew Owsiak）和艾米莉·威廉姆斯（Emily Williams）在研究上的帮助，感谢德琳达·斯旺森（Delinda Swanson）在论文写作上的帮助。我们也要感谢林恩·林纳出版社（Lynne Rienner Publishers），特别是林恩·林纳（Lynne Rienner）和克莱尔·弗尔斯克（Claire Vlcek）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也要感谢亚历克丝·贝拉米（Alex Bellamy）和里根·尼尔（Regan Neal）之前对绩效指标项目的贡献，这个项目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与昆士兰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共同支持。也要感谢昆士兰大学亚历克丝·庞德（Alex Pound）、埃玛·卡林（Emma Carlin）和特雷莎·凯利特（Theresa Kellett）提供的帮助。

目 录

第一章 和平行动的评价	1
理论上的重要性	2
政策的重要性	4
目前方法的价值	6
下一步的打算	8
第二章 评价的框架	10
和平行动评价的维度	10
评价的框架	22
第三章 维和的核心目标	25
暴力的减缓	27
冲突的遏制	31
冲突的调解	37
和平行动的有效性	42
结论	45
第四章 超越传统维和	53
选举监督	53
民主化	56
人道主义援助	60
裁军、复员和重返社会	63
人权保护	65
结论	68
第五章 冲突后缔造和平	76
地方安全	77
治安	81

◎ 和平行动的评价

地方治理	88
恢复、和解和变革	91
结论	94
第六章 环境的重要性	105
评价的议题	107
地方治理	118
当地的人口	126
第七章 整合	134
不同维度之间互动的概念化	135
框架的应用：波斯尼亚的维和	138
最后的思考	163
参考文献	165
译后记	199

第一章 和平行动的评价

许多人对索马里维和努力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是一个美国士兵尸体从摩加迪沙的大街上拖过。距和平行动首次部署在索马里已经将近 20 年，那里现在依然是一个失败国家，缺乏一个控制所有索马里领土的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部署在那里的两次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一次美国的和平行动都遭到了惨败。与此同时，维和者给成千上万个索马里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了食物和医疗救助，这毫无疑问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从这个有利的观点出发，和平行动是成功的。那么，什么可以解释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呢？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和平行动的标准，以及依据这些标准作出判断的证据。

确定哪些要素导致了和平行动的成功或失败，是形成与这些条件相关的因素方面的知识和作出良好政策选择的前提条件。尽管对这些关切予以重点关注，但是与维和及相关和平行动的文献在这方面并没有详尽地阐述。在和平行动研究中，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输入（或者自变量），相当少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的注意力关注结果（或者因变量）；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导致成功的因素而没有将精力集中于用以评价这个成功的标准上。

在本书中，我们后退一步，考虑和平行动是怎样评价的。和平行动包括一系列由国际组织、地区组织或者多国组织的部队实施的和平任务（传统的和平行动、强制的和平行动、缔造和平以及和平观察团），传统的军事行动没有包括在此之列。

如何进行和平行动评价没有初看起来那样清晰明确。选择成功的标准有很多种方法，从和平行动的结果方面来看，取决于一个人在和平行动的结果方面重视什么。在上面提及的索马里的案例中，高度关注的事项是治安和政府的权威，还是关注人类安全和对生命的保护将导致不同的评价结论。大多数情况下，和平行动是用来实现多个目标的，反映了不同的价值维度。即使是有一套明确的偏好，有时也难以确定预定的目标是否实现。如果人道主义的目标是最为重要的，难道成功可以用拯救生命的数目或失去生命的数目来衡量吗？从冲

突的程度或遇到的问题来说，这些标准难道合适吗？难道在 1000000 人中有 1000 人丧生就是成功，而当只有 10000 人处于危险之中也有同样数目的人丧生就视为失败吗？无论选择哪一种操作标准，都存在一些及时地获取关于和平行动效果的准确信息的实际问题；不做到这一点，理论上的结论和政策上的建议都是不可能的。

本书首先提出了一些与评价和平行动成功的相关问题。然而，仅仅展示所有的选择和相关的难题是不够的，因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一些理解和平行动的指南和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所遇到的障碍清单。因此，我们为决策者提供了评价和平行动成功的模式，这个模式包括判断和平行动的不同目标或目的，取得这些目标和目的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以及在回答这些问题被用作证据的操作指标。我们也讨论了与这些问题以及作为学术和政策制定分析工具的指标相关的优点和不足。我们没有提供一个单一的标准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和平行动成功的指标，实际上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幻想。然而，我们的确为分析家选择性理解和平行动成功的最好路径奠定了基础，并充分考虑到其有效性和模糊性。

这一章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详细说明了我们的努力对理论和目前已经完成的政策取向方面研究的价值，为本书采用的方法和随后的分析创造条件。结尾部分为其后的各章进行了总结。

理论上的重要性

当一个人思考给定的学术研究的理论贡献时，思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变量或预测变量上。模式上的创新主要来自于新变量或用以解释研究的现象的旧变量的重新组合。用来分析维和的因素包括行动的目标、后勤保障、东道国合作的程度、冲突的类型，更为通常的是冲突环境的各种不同的特征。更为普遍的问题是，要解释的问题仅仅是简单的设定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如果一旦被确定的话。然而，对于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而言，因变量是同等重要的，因为这些因素的提出是用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的。

许多因变量相对明了，反映了学术上达成的一致共识。例如，对国家间战争爆发的解释基于对什么构成了这一现象，对指标大体上的接受以及反映这些

指标的相应数据的共有理解。尽管对于战争发生的阈值存在着争论（多少战争死亡人数构成了战争），但是，在视为战争现象的大量参数（参见 Sarkees and Wayman, 2010; Gleditsch et al., 2002）中，这些分歧相对较少。对和平行动的成功或失败而言，情况并不是如此，或许因为对这个主题的研究还未成熟，相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知名的战争研究（事实上是战争本身）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新近的事情。就授权的复杂性、武力的组织和技术上的保障而言，和平行动在最近几十年内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难以将传统的行动（例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部署的联合国第一支部队 [UNEF I]）与新近的缔造和平行动（例如，北约的科索沃部队 [KFOR]）进行比较。正是因为这些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对和平行动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尚缺乏共识。

对理论的构建而言，确定什么构成了和平行动的成功是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成功只以暴力冲突（例如限制或结束战争）来界定的话，那么，含有特定因素的模型就可以建立起来，如自变量可能包括和平部队的资产和机构、交战方或者有助于停火的条件。然而，可以预见，如果和平行动成功不但意味着包括停止冲突，而且还包括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一套完全不同的因素或不同的过程就具有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种族的分离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量就可能成为解释的一部分。因此，和平行动成功的理论化要求对这个术语进行清晰的界定，正如我们在随后的章节中注意到的那样，有一些概念化的图式可供我们采纳。

即使对和平行动的成功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化操作定义，还需要这种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准确的指标。在我们看来，理论不仅仅是一系列的预测、假设或者规范性的偏好，而且还是一种接受了经验验证的特定的因果关系。这就要求，有待进行解释的现象具有可观察的特征，能够进行测量，并且在不同的案例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这些现象不一定能够量化，但对于分析家来说它们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能够进行系统的评价和复制。

理论取向的研究依赖于对和平行动进行清晰的概念化、操作化定义和测量，这是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参见 Drckman and Stern, 1997; Paris, 2000）。清晰性有利于对各种理论进行评价，比如对中观理论（如预期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和宏观理论（如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评价，这些理论都可

以用来描述和解释和平行动的影响。这种研究也依赖于精心建构的研究设计，这种设计能够意识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时滞和许多其他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最后，如果不对成功和失败进行明确的概念化操作定义和测量，维和文献中“公开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指南”（Fortna and Howard, 2008）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

政策的重要性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维和研究是一种非理论化的，或者聚焦于一种现实的关切，欲形成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战略，一些分析家将此称为“解决问题的理论”（Bellamy, 2004；也可参见 Paris, 2000）。许多著作和文章的作者、学者或实际工作者非常重视和平行动成功的条件；他们的目标是识别什么在起作用，而不是如何或者为什么起作用（Otunnu and Doyle, 1998）。同样的，联合国和许多国家的军队中有“最佳实践”或“经验教训”部。这些机构在挑选和平行动案例中审视过去的实践，力求探明哪些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着眼于进行政策上的改变，以便防止重蹈覆辙。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为了提高未来和平行动的质量，分析家寻求是什么导致了和平行动的成功。

关于和平行动成功的教训主要依靠成功所使用的衡量标准来进行评价。第一，含糊或粗劣地确定成功标准将会产生有瑕疵的或者无法使用的经验或教训；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了成功，确定是什么条件导致成功也是很困难的。第二，采用不同衡量成功的标准可能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例如，让维和者使用进攻性的军事策略，或者非强制性的接触规则，可以帮助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全，阻止侵犯人权（成功的两个标准），但是在此过程中却增加了平民的伤亡（成功或失败的另一个因素）。仅仅依靠一套标准得出的结论将导致政策制定者采用某些政策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政策的所有后果。因此，无论在一次和平行动或者多次和平行动中，使用不同的成功标准是合适的，因为决策者的目标各不相同。然而，更为普遍的是，正是由于要求对和平行动作出迅速的评价以及官僚机构的职责，导致决策者只注重了一些成功的标准而忽视了其他的成功标准。适用范围更广和更加完整地对成功进行详细说明有助于避免那些非故意或意料之外后果的发生（Aoi et al., 2007），诸如性虐待和疾病

蔓延之类的后果经常发生，因为和平行动是任务更大的缔造和平工程的组成部分。和平行动的另一个非故意的后果是导致经济复苏缓慢，这主要是由于较多地关注安全事务而导致的。第三，与此同时，标准之间的相互比较可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并不是所有的和平行动都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相对于那些处理国家间冲突的和平行动来说，部署在内战地区的和平行动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Howard，2008）。更确切地说，赋予维和者不同任务也需要对成功的识别有特定的测量或相应的指标。适合于所有和平行动的评价方法可能导致分析者错误地判断特定类型的维和行动或在特定的环境下实施的维和行动的成败。

以上的讨论设定了这样一种场景，分析家对过去的和平行动进行反思，然后得出结论，并且将这些结论运用到将来和平行动的计划和执行中。这当然是一个有效的应用，应该进行鼓励。然而，政策制定者经常要对和平行动进行评价，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和平行动作出实时的政策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其目标不是为未来的计划去理解成功和失败，而是为了确保目前的和平行动获得成功，以便这次行动不会成为未来“汲取教训”的失败案例。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功和失败的标准对于和平行动的总指挥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他们对这些和平行动拥有权力。如果停火线没有守住，那么就需要作出改变。具有明确的和平行动成功的标准就可以在行动期间进行经常性的评价，并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进行调整。

因此，恰当地界定和平行动的成功产生了一些政策制定上的好处。第一，恰当地界定和平行动的成功是有效地推论哪些因素与成功相关的前提条件。第二，恰当地界定成功能提供一个宽泛的、多层面的和平行动评价。第三，恰当地界定成功能提供了进行实时调整和相应的政策改变所依赖的必不可少的基线。当然，一个和平行动成功的模式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肯恩·门克豪斯（2003）警告这种情况的发生，即政策制定者和军队官员把符合标准作为目的本身，其他公共政策评价模式也受到这种批评，如对美国教育政策——“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评价标准问题。然而，避免这种陷阱仅仅要求这些标准是有效的和有意义的即可。在教育领域，考试必须测量学生学到了什么，在和平行动中，成功的指标必须现实地测量结果和掌握政策制定者认为非常重要的价值。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是我们分析的一个目标。通过在“是什么”(what)、“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这些问题上步步推进,我们希望既在和平行动理论上,又在应用的文献上作出贡献。这两种贡献都依赖于对自变量(过程和环境)和因变量(结果)进行清晰的说明。

目前方法的价值

与和平行动成功的条件相关的文献很多(关于这类文献的综述,参见 Diehl, 2008),这并不是说评价的标准是清晰的或有效的,只是表明许多学者追求的是对和平行动的政策取向的评价。一系列研究注重的是和平行动是否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否维持了和平。这些研究将注意力放在因变量上,其他的一些研究既包括这种评价,也辨别了一些成功的相关因素。这些研究更加关注自变量。从总体上说,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关注的是成功的条件,而不是导致其结果的机制(一个例外是 Fortna, 2008)。

尽管对于和平行动成功有相当多的知识基础,但是我们提出一些解决这些研究局限性的改进措施。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它们仅仅关注的是和平行动在总体上是否有积极的影响。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指导和平行动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框架。我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评价的问题上(测量或因变量),也讨论和平行动发生的较为宽泛的背景的方方面面(影响因素或自变量),以及可能存在的干预或解释变量。

第一,我们的著作提供了评价和平行动成功的清晰标准。现有大多数著作中没有衡量成功的标准,并且在书中也没有对成功进行操作化定义。分析家讨论和平行动遇到的问题,如多国部队中小分队的协调问题,然后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借以判断的标准来确定这些关注怎样代表了和平行动遇到的问题,更不用说为衡量难度的等级提供标准了。这些作者认为成功或失败是不言自明的,或者他们至少没有揭示出得出研究结论的程序的思维过程。

第二,除了和平行动成功的概念化标准外,我们也提供了与这些标准相对应的许多操作化的指标。即使分析者确定了成功的概念化定义,但是往往缺乏对这个定义的操作化测量,或者测量是不尽如人意的。和平行动的成功可以运

转良好的司法体系或功能完善的公民社会来界定。这些界定作为成功的标准是合理的，但是，对它们进行评价必须弄清楚现实中它们意味着什么。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表明公民社会发挥正常的功能？在缺乏明确的标准对不同的案例进行编码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可复制性的标准就不能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准确、不正确、有偏见或者兼而有之。

第三，我们构建了成功的指标，这些指标不受影响理想结果的事实制约。一些研究混淆了输入与结果，也就是说，分析者经常将成功所需的因素与对成功本身的测量相混淆。例如，判断一次和平行动成功与否可能需要通过提及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分配给代表团及其成员（USGAO，2003）。然而，资源的提供可能是成功的一个决定因素，但不能以此来衡量成功与否。应用型研究提及“进步的测量”，但这种测量是一种短期的或暂时的成功指标。尽管如此，诸如像当地警察训练机构的建立或者支持当地宗教领袖等此类因素可能是成功的前提条件。它们并不是成功产生的结果本身，除非它们是代表团预期的目标。

第四，我们的框架力求在可广泛应用的结论和具体背景下的评价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许多关于和平行动有效性的研究基于单一的案例（Ranter，1995；Mays，2002；Olonisakin，2007），因而任何结论都会出现问题。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成功的标准对和平行动的背景和过程来说是十分具体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强化了评价的有效性，因为这样做更加细致地注意到环境所起的作用。这样的信息对于部署在任务区的维和者来说是有用的，但对于未来的任务区吸取教训而言却没有多大作用。吸取教训的政策分析通过将结论从一个环境运用到另一个环境中进行预测。具体案例的标准或指标限制了政策制定者将他们从一个和平行动中中学到的启示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中去的能力，以及将其调整并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为比较不同任务区的成绩和进行归纳的需要，研究者必须能够构建一些成功的普通标准和指标。具体案例的标准妨碍了观点的经验验证与和平行动理论的构建，因此阻碍了总体知识的增长和模式的发展。打个比方来说，和平行动研究已经是一丛树林，但是在不同的和平行动之间如果没有可比较的指标，森林就不可能显现出来。

第五，我们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行动成功的多维概念。目前有一种用单一维度来评价和平行动的趋势，尽管概念和测量的基础都较为可靠。这可能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经常期望明确的评价（这次行动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有关，这将导致进行单一的评价。例如，一个和平行动成功的指标是武装冲突是否重新发生（例如，Enterline and Kang, 2002; Jo, 2006），然而，和平行动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和平行动取得完全的成功或遭到完全的失败，都是极为罕见的。相反，在这一系列的维度中，如裁军、谈判取得的成绩、协议的实施，法律和经济体系功能的发挥和生活质量等，有的方面做得较好，有的方面做得较差。为了对一个派遣到世界动乱地区和平行动进行计划、作出调整并对其结果进行评价，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这种变化，包括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没有考虑维和人员强奸或从事其他犯罪行为将漏掉和平行动对当地的重要影响，从而导致计划者在未来的行动中忽视这些关切。

下一步的打算

在以下几章中，我们沿着界定和平行动成功的过程前进。第二章为评价和平行动的成功提供了一个过程和评价的模式。从讨论评价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开始，这些关键因素是：（1）利益相关者；（2）时间的视角；（3）评价的基准；（4）“归并”；（5）任务的类型。本章从宽泛目标的辨别、与这些目标相关的关键问题的提出，以及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的可测量的指标等方面开始讨论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奠定了以下几章的分析基础。

无论被授予什么样的任务，和平行动具有一些共同的核心指标。在第三章中，我们阐述了暴力的缓和、冲突的控制和冲突的调解等较为宽泛的目标。我们从学术的和政策制定的文献以及我们的分析中，确定了在这些共同的维度上与成功相关的几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是成功的关键指标，并且指出对学术和政策制定分析而言这些指标的优点和局限性。我们用具体的和平行动来进行说明。在第三章中我们也考虑了对维和人员自身来说共同的目标问题。

第四章按照第三章的模式进行，但重点关注与和平行动相关的更加具体的任务，尤其是那些超越了传统的监督和干预功能的任务。其中许多任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这些任务包括监督选举、裁军、复员，